**徙木立信 身体力行**

**——学思践悟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北京物资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建宝**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从这一时刻起，八项规定不仅在近1亿党员的政治生活中成为一个核心词汇，也成为14亿中国人社会生活中一个影响深远的特殊词汇，成为重塑党风、政风及至整个社会风气的抓手。

2025年3月，党中央决定，2025年全国两会后至7月，集中深入学习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这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部署。那么:

第一为什么出台中央八项规定？

第二中央八项规定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第三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如何具体地落实，落实得怎么样？

第四为什么今年要在全党集中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呢？

第五我们如何立足岗位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呢？

我力求通过这五个问题，来向大家汇报我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思用贯通、知信行合一的理解

**一、中央八项规定出台的背景**

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徙木立信之举，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十年不够就二十年，二十年不够就三十年，直至真正化风成俗，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

1978年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1992年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1年入世，2012年十八大，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迅猛发展。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总和，这是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总体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王者荣耀分为七大段位：倔强青铜、秩序白银、荣耀黄金、尊贵铂金、永恒钻石、至尊星耀、最强王者，每一位参与游戏的人，都要激烈竞争，以求不断升级，最终成为最强王者。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其实也是如此。中国GDP在国际范围内的地位，正是一个完美的走向荣耀王者的升级过程。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叫G7集团，这是由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组成的7国集团，一个名副其实的富人俱乐部，7个国家都是最发达的工业国。那么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比较是怎样的呢？1995年中国GDP总量超越加拿大，跃居全球第七；2000年超越意大利，居世界第六；2005年超越法国，上排第五；2006年超过英国，居世界第四；2007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2010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

但是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我们党长期执政是优势，但这容易使党员领导干部高枕无忧，放松党风建设。国外政党兴衰沉浮的诸多经验表明，一个政党如果不能经受住执政的考验、不能有效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垮台是迟早的事。苏联就是前车之鉴嘛。曾经，苏联共产党凭借20万党员的英勇斗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创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政权；200万党员时，他们力挽狂澜，战胜了纳粹德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贡献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9月3日大阅兵）。然而，当党员数量膨胀至2000万，强大的苏联共产党却骤然瓦解，昔日超级大国分崩离析。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上就很痛心地这样讲：“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

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不容忽视的问题：党风政风问题严重、腐败现象愈演愈烈，面临着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四大考验”和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

“四大危险”“四大考验”最为直接地反映在作风问题上。十八大以前，我们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越来越复杂地表现出来，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在思想作风方面脱离实际。一些干部受旧习惯的影响，养成了不思为基层、为群众服务，整天只是喊口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官本位”思想严重，开会讲什么不清楚，自己坐什么位置很清楚；干好干坏不清楚，要提拔谁很清楚；谁送的礼不清楚，谁没有送礼很清楚；还有官场的潜规则，干部调整、提拔收钱等等。

在工作作风方面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以会议传达会议、以讲话学习讲话、以文件落实文件，做表面文章，喜欢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作指示，不入基层调研，对群众反映的情况和百姓冷暖态度冷漠，应付了事。当时还有一些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还有网民所列的一些官话套话：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

在生活作风方面贪图享受、腐败堕落。有资料显示，中国公款吃喝1990年400亿元，1992年超过80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2002年达到2000亿元，2004年为3700亿元，2005年竟然达到6000亿元。公款吃喝、铺张浪费、摆阔气、讲排场，影响了整个社会风气，背离了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严重危害党的形象和威信。还有的干部腐败堕落，比如湖北省天门市“五毒书记”张二江与107名女人有染，加上妻子，正好凑足“一百零八将”；被12秒不雅视频曝光的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案，引出了重庆多名政企高层涉不雅视频被免职。所以，作风问题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阶段。

所以总书记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长期执政，党内形形色色的作风问题越是突出，我们越是要加强作风教育和作风建设。”总书记明确提出，“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很牢固，但如果作风问题解决不好，也有可能出现‘霸王别姬’这样的时刻”；“执政党如果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就有失去民心、丧失政权的危险”。

正是这样的背景下，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会议强调，制定这方面的规定，指导思想就是从严要求，体现从严治党。这体现清醒的历史自觉——后来“自我革命”！

也是科学的方法论。党的十八大之后，面对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党要管党怎么管？全面从严治党怎么严？经过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断然决定，从作风建设特别是整治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突出问题抓起，“从小抓起，以小见大，以小带大”，这就找到了突破口，解决了新形势下作风建设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改进工作作风的任务非常繁重，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谈制定出台中央八项规定的初衷：“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讨论加强党的建设如何抓时，就想到要解决‘老虎吃天不知从哪儿下口’的问题。后来决定就抓八项规定，下口就要真正把那块吃进去、消化掉”。八项规定出台十二年多来，从抓月饼、抓贺卡、抓烟花爆竹，到抓节假日、抓“八小时外”、抓日常……一个个具体问题的突破，带动面上问题的解决。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当时很少人预见到，公款吃喝等中国官场的“老大难”问题，竟然出现如此明显的改观。

自2012年出台以来，开启了党内激浊扬清的作风之变。从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刹住“车轮上的腐败”、整治“会所中的歪风”，到持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八项规定在贯彻落实中不离初衷、不打折扣，一以贯之、一路前行。

**二、中央八项规定的成效**

**（一）政治生态的改善**

《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中国政治生态。通过整治“四风”问题，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得到了明显改进，政府工作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时，也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2017年平谷区首创“街乡吹哨、部门报到”；进而“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依托12345市民服务热线创新开展“吹哨报到”“接诉即办”；如今又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如何能够做到未诉先办？基于对基层社情、民情的充分把握，基于天气预报那般前瞻式的信息搜集和研判。

**（二）人民生活的改变**

《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不仅改变了政府的工作作风，也深刻影响了民众的生活。通过精简会议、文件和新闻报道等措施，减少了不必要的行政开支，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这些资源被用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让民众切实感受到了政策的实惠。

例如，在一些地区，政府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改善基础设施、提高教育水平等方面。这些举措不仅提高了民众的生活质量，也为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社会风气的转变**

《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还带动了社会风气的转变。通过倡导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的理念，引导社会各界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这种社会风气的转变不仅有助于提升国民素质，也有助于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例如，在一些城市，市民开始注重环保、节能等方面的生活细节。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不仅有利于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也有助于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和品质。

**（四）中央八项规定效果解读及案例分析**

2013年11月1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第一次向社会公开发布2013年9月份全国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查处数据，向社会持续释放驰而不息纠“四风”的强烈信号。

**（一）数据分析**

1.数据显示，八项规定实施以来，截至2016年8月31日，全国已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39622起、处理187409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91913人。

2.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07547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5366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08695人。

从查处问题类型看，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2023年共查处问题39781起，占查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86.9%。2023年查处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违规吃喝、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3类问题，分别占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的42.1%、23.8%、15.3%。

从查处级别看，2023年，全国共查处省部级领导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0起，地厅级领导干部问题649起，查处县处级领导干部问题7899起，查处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98989起。其中，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占查处问题总数的92.0%。

3.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2527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2907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21369人。

从查处问题类型看，2024年，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共查处问题93833起，占查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87.5%。查处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违规吃喝、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3类问题，分别占2024年查处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总数的49.2%、22.7%、14.9%。

从查处级别看，2024年，全国共查处省部级领导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9起，地厅级领导干部问题981起，县处级领导干部问题12910起，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211375起。其中，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占查处问题总数的93.8%。

党纪政务处分的比例在上升，彰显“全面”+“从严”治党！

**（二）理论解析**

此处我们需以整体思维把握党性、党风、党纪这三个基础概念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都还是积极分子，我们都在积极追求加入党组织，我们都向党组织表示，以一名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一名党员的标准是什么？根本上就两个字：党性。党性这两个字，千钧之重的。

1950年1月，中央决定解放西藏。刘伯承和邓小平收到了毛泽东发来的电报：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现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为此，建议：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1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部队及领导接管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

当时，张国华任军长的第18军已经明确接管富庶的川南，张国华已经被任命为川南行署主任。就在1月7日张国华赴川南行署上任途中，突然收到刘、邓急电：十八军就地待命，张军长及各师主要领导干部速来重庆。1月10日，张国华赶到重庆，邓小平亲自找他谈话。

谈话时，邓小平单刀直入：“今天谈话凭党性。”

张国华回答：“ 一切听从党安排。”

邓小平说：“ 有人不去西藏，你指挥部队去。”

张国华回答：“坚决完成任务！”

仅仅几句话，就足以看出张国华的党性光彩照人。

付出巨大牺牲进军西藏，张国华个人更是在西藏整整工作了17年。1972年2月11日，年仅58岁的张国华逝世。1972年3月11日，一架飞机缓缓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飞机上运的是开国中将张国华的骨灰，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骨灰进京。享受过这种礼遇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陈赓大将，另一个就是张国华。

有的同志一定程度上会有这样的错误认识，那就是：党性看不见摸不着，党性强不强，主要是主观评判。党性真的看不见摸不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

党性是共产党员立身、立德、立言、立业的基石；坚持党性原则，是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品格；党性坚强才能作风过硬、纪律严明。

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

纪律是党的生命线，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没有严明的纪律做保证，作风建设、党性教育就难以持久地进行下去。

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是管党治党系统思维的体现，是对正风肃纪规律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把增强党性、严守纪律、砥砺作风融入日常、化为习惯；要通过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发共产党员崇高理想追求，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看成极大耻辱。

**（三）案例分析**

下面结合党风、党纪，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一些案例分析，以作警醒。

**01违反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的行为**

一、表现形式：一是超标准、超范围接待；二是借公务接待之机大吃大喝；三是其他违反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的行为。

二、有关规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关于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意见》及其他关于公务接待的省、市的具体规定。

三、党纪条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九十九条规定：“违反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超标准、超范围或者借机大吃大喝”，指的是公务安排的迎送方式、陪同人数、活动场所、活动项目和活动方式、住宿、用餐以及出行活动的标准和范围超过了《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和公务活动当地接待的规定标准，或者在公务接待活动中，接待单位在安排就餐时多次宴请，或者陪餐人数过多，或者超过用餐标准，提供高档菜肴或者野生保护动物制作的菜肴，提供香烟和高档酒水，或者使用私人会所、高消费餐饮场所等奢侈浪费行为。

“公务活动当地接待的规定标准”，是指各级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部门按照中央精神，结合当地或本单位实际，制定的国内公务接待标准。在规定标准范围之内的接待是允许的，超出这个范围的，都属于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需要注意的是，违反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的提供接待的接待方和参与接待的被接待方都要受到纪律追究。既要追究违规公务接待的决定者、组织者和参与者，也要追究对违规公务接待负有领导责任的党员领导干部。

“其他违反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的行为”，是指违反《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关于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意见》及其他关于公务接待的省、市等具体规定的行为，不能一一列举。如，《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对无公函的公务活动不予接待，严禁将非公务活动纳入接待范围”，因此，对于没有公函却以公务活动接待的名义进行宴请，应当归入公款宴请范围，以违纪论处。

案例：2023年5月，某高校举办产学研一体化工作会。会后，当日18时左右，安排参会人员到当地某酒店就餐。就餐人员共计50余人，餐饮费标准为150元/人。晚餐后，安排主要嘉宾入住某国际酒店（非公务接待定点酒店，五星级）豪华套房4间（协议价868元/间）。以上相关费用由学校按照学术会议予以支付。以上住宿标准、餐费标准均超标准，是超标准接待的违纪行为，有关费用应由相关人退赔。

**02公款旅游行为**

一、表现形式：一是用公款旅游；二是借公务差旅之机旅游；三是以公务差旅为名变相旅游；四是以各种名义变相用公款出国境旅游。一些变相用公款旅游的常见表现形式：

①考察学习游。为了容易通过审批和财务报账，一些单位将公款旅游穿上“考察”、“学习”等公务活动的“马甲”，进行公款旅游或变相公款旅游，将工作学习地点安排在风景区、大城市，工作议程安排松弛，堂而皇之地游山玩水。

②红色教育游。前几年有的单位打着接受“红色教育”的招牌，行游山玩水之实，甚至在“红色线路”的选择上，搞“红”“绿”相间，暨游红色圣地，也纵情山水。

③他人支出游。一些单位负责人参加下属单位和企业组织的考察旅游活动。

二、有关规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的通知》、《中共中央纪委关于制止以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为名组织公款旅游的通知》

三、党纪条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九十八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用公款旅游、借公务差旅之机旅游或者以公务差旅为名变相旅游的；（二）以考察、学习、培训、研讨、招商、参展等名义变相用公款出国（境）旅游的。

案例：2022年6月，XX组织学院教研室主任一行5人赴河南考察学习高校大思政课建设，中途改变行程，赴XX地旅游，费用从考察学习经费中支出。这就属于典型的以考察之名行公款旅游之实的违纪行为，在实践中必须清醒防范。

**三、为什么集中开展深入贯彻学习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全面从严治党，始终在路上，任重而道远。其中的作风问题，同样如此，需要久久为功，这才有可能化风为俗。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党的作风建设的基本思想：密切联系广大人民群众，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但正如2025年1月6日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所作的深刻分析：“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腐败存量尚未清除，增量还在持续发生，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因此，必须“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必须“始终坚持零容忍，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铁规矩、硬杠杠，严肃查处顶风违纪、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

泰山“快活三里”路碑上有这样一段话：路平景幽，林茂风清，游人登山至此，忽遇坦途，好不快活。所以取名“快活三里”。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泰山半腰有一段平路叫“快活三里”，一些人爬累了，喜欢在此歇脚。然而，挑山工一般不在此久留，因为休息时间长了，腿就会“发懒”，再上“十八盘”就更困难了。作风建设同样如此，越到紧要关头越不能有丝毫松懈。只要以滚石上山的劲头、爬坡过坎的勇气，保持定力、寸步不让，深化整治、见底见效，就能一步步实现弊绝风清、海晏河清。

中央八项规定针对的问题，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可谓顽疾中的顽疾，可谓“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纵观我们党的历史，始终是跟“四风”问题作斗争，而且必然还将继续斗争下去。其中，又尤其以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危害最大。早在2001年，江泽民就指出：“现在，在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群众反映最大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形式主义，二是官僚主义。这必须引起全党上下的高度重视，必须痛下决心把这两股歪风刹住，越快越好。”他的这个讲话，以《关于改进党的作风》为题发表在《求是》2001年第1期。但是，谈何容易？

比如，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这是党中央连续7年专门部署推动的重要工作。中央专门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解决了一批突出问题，刹住了一些歪风邪气，过去令基层干部叫苦不迭、束手束脚的形式主义问题大大减少。但也要看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弊非一日之寒，一些加重基层负担的问题仍然屡禁不止，新情况新动向仍在滋生。文山会海、督查检查调研扎堆、工作过度留痕、任务层层加码、“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等问题依然不尽如人意。2024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处文山会海反弹回潮，文风会风不实不正，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给基层造成严重负担问题22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50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00人。

我们着重在党史的视野中来看“官僚主义”问题。列宁曾经讲：“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1927年10月，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就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向部队宣布了三条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

1928年1月，我军攻占遂川县城后，毛泽东认真总结做群众工作的经验，提出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1928年春，部队到达湖南桂东沙田村后，毛泽东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1929年，毛泽东在率领红四军向赣南和闽西进军时，又将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1947年10月，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大反攻的关键时期，为了适应大兵团作战的需要，我军修订和统一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三大纪律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为：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多次修改颁布的纪律条令，都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主要内容写进条令。图为湖南桂东县沙田村戏台。1928年春，毛泽东在这里郑重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1933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的讲话中就鲜明地指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在随后一个时期的多个场合中，毛泽东反复提及并要求在工作中反对官僚主义、克服官僚主义。其中，尤以毛泽东于1934年1月27日所作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最为著名。1934年1月2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沙坪坝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隆重开幕。1月24日下午至25日，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们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1月27日，毛泽东根据代表们讨论的情况，作《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结论》，之后题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毛泽东在讲话中提醒代表们要着重注意两个问题，即“关于群众生活的问题”和“关于工作方法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对于实现党“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这一“中心任务”至关重要。然而，要解决好这两个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是因为我们的干部在苏区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正在影响着我们工作开展的成效。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表现作了具体分析，他指出：“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结果是失去信用，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命令主义地推销公债，不管群众了解不了解，买不买得这样多，只是蛮横地要照自己的数目字去派，结果是群众不喜欢，公债不能好好地推销。”他着重强调，官僚主义是苏维埃工作的障碍，“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

认识到官僚主义的危害，如何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呢？毛泽东向大会代表们推荐了江西长冈乡、福建才溪乡两个模范案例，号召大家向长冈乡、才溪乡学习，做出像兴国县、赣东北的同志们那样的“第一等的工作”。

谢步升案：我党反腐“第一枪”。谢步升是我党反腐败历史上被枪毙的第一个“贪官”。谢步升是瑞金县叶坪乡人，家境贫穷，12岁起给地主打短工，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1930年，谢步升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这个官职虽然不大，但随着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的建立，他的声望陡然增高。然而他的思想作风却也逐渐变质，他偷盖苏维埃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大印，伪造通行证等证件，私自贩运水牛到白区出售，每头牛获利大洋3元。他将一位八一南昌起义南下部队掉队的红军军医秘密杀害，占有了其金戒指和毯子。他生活腐化堕落，与一个大地主续弦的老婆勾搭成好。他嫌自己的妻子杨氏碍手碍脚，便把她卖给邻村一个老光棍做老婆，明里却对邻居说杨氏回娘家了，几个月后又说她改嫁了。1932年2月，谢步升企图强奸同村的一个妇女，被举报到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一一当时在苏区中央局任职的谢春山，却认为谢步升并无大错。于是，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苏区中央局的领导通知瑞金县裁判部释放谢步升，并称由中央局调查处理谢步升的问题。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得知后十分气愤，拍着桌子说：“像谢步升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不处理，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他决定亲自去苏区中央局，反映谢步升的犯罪事实，同时要调查员去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情况。毛泽东当场表态：“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生进行公审判决，判处谢步升死刑。谢步升不服，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开庭审理，否决了谢步升的上诉，维持原判，并判决：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三小时内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一切财产。当日下午，红都瑞金响起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第一声惩治腐败分子的枪声。

黄克功案：现代版挥泪斩“马谡”。黄克功，延安时期团级干部（这在当时是高级干部，国共合作抗日下，红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朱德为军长）。1937年10月5日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的女学员刘茜，由一个革命的功臣堕落为杀人犯。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召开会议，认为：“如果我们今天不判黄克功死刑，就是判了我们未来的死刑!” 1937年10月12日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判决死刑并立即执行。

国民党那边，是怎样的情形呢？张灵甫，1903年出生于陕西省长安县。他的出身并不好，家里十分的贫困，甚至一度连学都上不起。家人看出了他学习方面的天赋，叔叔舅舅都拿出钱来供他学习，指望着这个孩子能学有所成光宗耀祖。他也并没辜负家人的期望，在18岁考入长安中学，并在两年后考入北大历史系。在大学期间，他的父亲在老家给他定下一门亲事，要求他娶邻村的姑娘邢凤英为妻。此时的张灵甫已经是北大学子，怎么愿意娶一个大字不识的村姑为妻子？但是父亲一再施压，他不能不遵守孝道，最终他与邻村姑娘邢凤英完婚。随后，张灵甫继续在北大求学，但是北大的学费对于他的家庭来说太过昂贵，无力支撑的他选择了退学。退学后，他加入到国民二军驻豫军官训练团，因为其聪明才智，被推荐南下广州。1926年，他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四期，黄埔军校毕业后，他一路高升为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33年，更是被调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升迁至团长。此时的张灵甫是无限风光，他深得蒋介石信任，权力在手愈发地膨胀。他更加觉得家乡的妻子配不上自己。 他认为自己生的仪表堂堂，应该娶一位有才华又貌美的妻子才相配。在部队里朋友的介绍下，张灵甫认识了受过良好的教育吴海兰，吴海兰长得美艳动人，气质出众、穿起旗袍来更是婀娜多姿。张灵甫当即对吴海兰展开强烈的追求。吴海兰对这位身居高位的军官，同样有着好感，他不仅有权有势还长相帅气，追起佳人来出手也十分阔绰。在1933年的冬天两人举办了婚礼，才子配佳人，传为一时美谈。婚后，吴海兰为其生下一女。由于战争，张灵甫常年在前线，二人难得团聚。1936年新春即将到来之际，张灵甫向胡宗南请假，回汉中看望妻女。随后，他带着妻女回长安老家。几天后的一个早上，他对吴海兰说道：“好久没吃你包的饺子了，给我包一顿饺子吧。”吴海兰满口答应，拿着菜篮和剪刀朝着后院走去，那里有一块韭菜地，韭菜饺子是张灵甫的最爱。来到后院吴海兰专心在菜地里收割着韭菜，浑然没发现丈夫出现在身后。张灵甫站在吴海兰背后，看着妻子的背影，拿出了藏在衣服中的手枪，将枪口对准了她的后脑勺扣下了扳机。随着一声枪响，吴海兰手中的篮子落地，人倒在了菜地里。张灵甫将死去的妻子就地掩埋，还将她的随身衣物都烧毁，便回到了部队里。然而他的杀妻行为，却被留在老家的妻子邢凤英目睹。无法过了心里那关的邢凤英将吴海兰已经死亡的消息传到了吴海兰娘家那边，事件由此暴露。当时，我国民众的女权意识已经逐渐觉醒，张学良的妻子于凤至，一直致力于保障妇女的利益。于凤至得知张灵甫杀妻一案，当即对丈夫张学良提及此事，要求必须严惩此人。但是张灵甫是归属中央军旗下，作为东北军首领的张学良，即使有心也难以审判他。于凤至发了一封电报给在南京的宋美龄，希望她来主持公道。宋美龄看到电报后，将此事报告给了丈夫蒋介石。蒋介石一直对张灵甫十分看重，没想到他竟犯下如此罪行。张灵甫杀妻一事，在西安闹得沸沸扬扬，民众都要求审判这个丧心病狂的杀妻凶手。蒋介石没办法只得下令将张灵甫撤职，将他押往南京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在法庭上张灵甫对杀妻罪行供认不讳，对于杀人动机，只说是感情纠纷。外界本以为张灵甫这次肯定要被判处死刑，不曾想审判结果下来竟只判了十年，还被送到了“模范监狱”。在模范监狱里，张灵甫过得十分舒心，不愁吃不愁喝，丝毫没有阶下囚的模样。等到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更是以打仗需要人才之由，将张灵甫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张灵甫脱下囚犯换上军装，又成为那个威风凛凛的军官。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不顾道义再次发动内战，使得国共两军再次站到对立面。1947年5月，张灵甫所领国民党74师在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东南孟良崮地区被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全歼，作为师长的张灵甫也被击毙。

这就是延安作风战胜西安作风的缩影。1939年的一天，毛泽东应邀到延安马列学院作报告。马列学院特意安排教育处处长邓力群、教育干事安平生、宣传干事马洪和校务处处长韩世福到杨家岭去迎接，中途在延河的一座桥上迎面遇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得知了他们的来意后，哈哈大笑说:“四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用轿子来抬我呀？下回跟你们领导说，再来四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再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看好不好？”

毛泽东的幽默，把大家都逗乐了。他接着又说：“那才不像话嘛，对不对？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是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我们既要革命，既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得了什么？我又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送的嘛！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作风，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西安作风又是什么？它指的是当时国民党的官僚和军阀作风，即享乐奢靡之风。1940年回国考察的爱国华侨陈嘉庚，深为国民党官场的腐朽景象所震惊：一到重庆，就听说国民政府拨专款8万元，预订了重庆所有知名旅馆的一、二等房间用于接待，对此他不禁愕然；在与国民党军政要员接触中，陈嘉庚也深感他们作风奢靡，后在回忆录中写道：“重庆虽在战时，而奢侈应酬颇热闹，每席有至百元者”，并有同行者“自元月间到渝，至三月末与余同寓为止，计六十馀（余）天，无日不被人招宴，常有一日两次者”。

到延安后，陈嘉庚的感受却截然不同。他看到毛泽东拿一罐英国烟待客，却坦言：“我每个月的薪俸有限，不配抽这样名贵的香烟，这一罐是美国华侨司徒美堂送的。”有一次，毛泽东一根烟抽过一半时，恰好有客求见，却舍不得把半截烟丢掉，只是掐了烟头去见客，回来又把半截烟蒂抽完。毛泽东请陈嘉庚吃饭，就是在窑洞外的露天院子里，将一个陈旧的圆桌面放到方桌上，用4张白纸代替桌布，一阵风吹来，还把“桌布”吹走了。吃的是白菜、咸饭，只是特地上了一盆鸡汤。毛泽东笑谈：“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 他又听说延安干部“贪污五十元者革职，五百元者枪毙”，与国民党内形成鲜明对比。种种对比，让陈嘉庚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抗战胜利后，沦陷区人民渴望着国民党中央派人前去接收，可是国民党接收大员却贪婪地搜刮民财，强取豪夺，把沦陷区搞得乌烟瘴气，怨声载道。民众讥称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是“五子登科”，即只知道掠夺金子、房子、车子、票子、女子；是“三迷成风”，即财迷、色迷、官迷成风；是“三洋开泰”，即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当时北平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盼老蒋、望老蒋，老蒋来了米面涨。”延安作风和西安作风，就是这样泾渭分明。

1944年，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上，毛泽东讲到官僚主义的问题时，形象地把官僚主义者比喻为“泥塑的神像”。他说，除了三餐不食这一点不像外，官僚主义者的其他方面都很像一座神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对官僚主义者的讽刺，可谓鞭辟入里、入木三分。优良的党风党纪，大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

在全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际，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3月5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了防止“糖衣炮弹”的腐蚀，力戒骄傲，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七届二中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六条具体规定：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建国后，毛主席多次强调这“六条规定”。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在记载着这“六条规定”的红底白字展板前驻足良久。他一一对照着说：“不做寿，这条做到了；不送礼，这个还有问题，所以反‘四风’要解决这个问题；少敬酒，现在公款吃喝得到遏制，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少拍掌，我们也提倡；不以人名命名地名，这一条坚持下来了；第六条，我们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1949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面对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局势，毛泽东说：“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毛泽东将进京看作是“赶考”，并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但是，诚如毛泽东所分析的那样，由于受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的影响，以及我们的领导干部在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上的经验不足，官僚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后并不会马上消失，“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必须要跟它作长期的斗争。

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回国后在哈尔滨停留，当时的中共松江省委，也就是今天的中共黑龙江省委安排他住进了哈尔滨颐园街1号的一栋高档别墅里。毛泽东看了看四周，说：“这个地方不好啊，一个人住在这里，不沾染官僚主义才怪哩。”晚上用餐时，省委准备了当时最好的山珍海味，毛泽东看到皱了皱眉头，简单动了几筷子，饭后，他专门向他的警卫员交代：“今后吃饭要从简，我们国家还很穷，没有必要嘛”。随后，当省委负责同志请毛泽东为中共松江省委题词时，毛泽东写下了“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十个大字。正是在这样背景下，毛泽东为松江（现为黑龙江）省委和哈尔滨市委写下了“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的题词。这一警告不仅体现了毛泽东见微知著，也可谓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实际应用。